南京大学CSSCI来源集刊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16卷 Vol.16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请支持正版书籍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 16 卷

Vol.16

孟 捷 龚 刚 主编

格 致 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报.第16卷/孟捷,龚刚主编.—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432-3077-4

Ⅰ.①政… Ⅱ.①孟… ②龚… Ⅲ.①政治经济学-
文集 Ⅳ.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99136号

责任编辑 唐彬源 钱 敏
装帧设计 路 静

政治经济学报(第16卷)
孟捷 龚刚 主编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29,000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3077-4/F·1267
定 价 68.00元

目 录

CONTENTS

1 政治经济学研究

3 生产性效率、工业化和中国经济增长 / 卢 荻 黎贵才

19 新中国 70 年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思想演进：历程、主线及动力 / 蒋永穆 李善越

34 理解中国模式
——国家能力的视角 / 杨虎涛 刘 方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功能与架构 / 李家祥

63 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基于学术史的研究 / 林光彬 拓志超

97 新中国 70 年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事实、根据及启示 / 乔 榛

111 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用地保障论析 / 李 杰 段龙龙

129 数理政治经济学

131 均衡条件下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变化规律 / 朱殊洋

146 基于再生产理论的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探讨 / 严金强

159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16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思想史的视角
／陈　琳　张配豪　杨　茜

188 社会关系异化：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马克思的发展／谢　超

205 经典文献

207 春潮
——对产业发展和价格运动的思考／范·盖尔德伦

261 学术评论

263 现代货币理论是“美国优先”的经济学吗？／杰拉尔德·爱泼斯坦

269 学术书评

271 长波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评孟捷、高峰著《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李亚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政治经济学研究

生产性效率、工业化和中国经济增长*

卢　荻　黎贵才**

摘　要　中国在其系统性改革时代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后进发展具有普遍意义。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对此经验的解释，中心概念是一种包含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性效率的不稳定组合的演化发展路径。鉴于此，本文的分析和发现给出了两个主要命题。第一，相对于体制层面的市场化改革导向，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实际路径却倾向于与市场原则，也即（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相矛盾。这个路径主导方向是资本深化，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如是。第二，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既包含压制市场因素，也包含遵循市场因素。相对而言，这两者分别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为代表，生产性效率的提高主要是来自前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则主要是来自后者。针对这些分析发现，本文试图结合整体的中国经济变革经验，讨论其重要性和政策含义。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工业化　生产性效率　经济体制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众所周知，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去发展的二十年”。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在1980—2000年间，就平均表现而言，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处于令人沮丧的低水平，而且是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表现。同一时期，发展中世界的内部分化也是日趋严重，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增长表现远超其他国家，而南亚地区增长速度也是显著快于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表现。可以说，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失去发展的二十年”一词并不夸张。

面对上述的后进发展图景，相关学术文献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分析性问题。第一，

---

*　本文原作是英文，在2011年发表于《后凯恩斯经济学学报》，现翻译成中文，并将分析时段延伸至2014年，同时衷心感谢Jan Kregel、Costas Lapavitsas、孟捷、Mike Rafferty、Alfredo Saad Filho、Pingu Zeng和张宇提供的有益评论。

**　卢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黎贵才是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两位作者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表1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1960—1980年	1980—2000年	2000—2014年
中国	3.0	8.5	9.1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	3.1	1.2	4.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3.3	6.1	7.5
欧洲和中亚	—	-0.3	4.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2	0.3	3.4
中东和北非	—	-0.2	3.3
南亚	1.3	3.1	5.3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5	-1.1	3.7
高收入经济体	3.4	2.2	3.0

注：表中数值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

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去工业化趋势有关，或至少与工业化停滞有关。这与中国以至整体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快速推进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引申的深层次问题是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更一般地说，全球化背景下后进发展所需要的结构性条件是什么（Lo and Zhang，2011；Weeks，2001）？第二，有学者指出，后进发展之所以普遍停滞，是由“政策导向的改革”所致，因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在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Easterly，2001）。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后进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是什么？近年来，在发展政策制定机构和主流经济学文献中所谓的“新比较经济学”的兴起，可看作是对此问题的特殊但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尝试式回答（Djankov et al.，2003；Rodrik，2007，ch.5 and ch.6）。

本文旨在分析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构和制度条件，着重讨论增长的演进路径，以及体现其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性效率两者间不确定的混合特征。由此引申出两个主要命题：第一，相对于体制层面的市场化改革导向，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实际路径却是倾向于与市场原则，亦即与（由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相背离，而是由资本深化所主导，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既包含压制市场因素，也包含遵循市场因素。具体而言，这两者分别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得以体现，其中生产性效率的提高反映在前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则主要反映在后者。这两个论题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相对其他所有制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由于其具有较为长期导向的制度特性，更为适合资本深化的发展路径。因此，中国经济的结构特性与制度特性这两者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得以相互强化。

在下一节中，我们试图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重点关注工业化进程的作

用。第三部分接着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表现的更根本原因——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制度特征，它们构成并维持了一条高绩效的发展路径。第四部分讨论本文研究结果对现有文献的意义，并得出一系列关于中国整体经济变革的未来前景的政策启示。我们最后收尾于一些关于中国和后进发展整体的结论。

一、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一）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中工业化的贡献

就表面现象看，认为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直接动力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这应该是合理判断。在表 1 所示的全球化年代的经济增长国际比较之外，必须注意到，同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 1980 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比重为 17.8%，2000 年增长至 32.4%，至 2014 年更增长至 56.0%，同期不包括中国（内地）的东亚地区所占的比重则分别是 8.0%、11.7%和 8.6%（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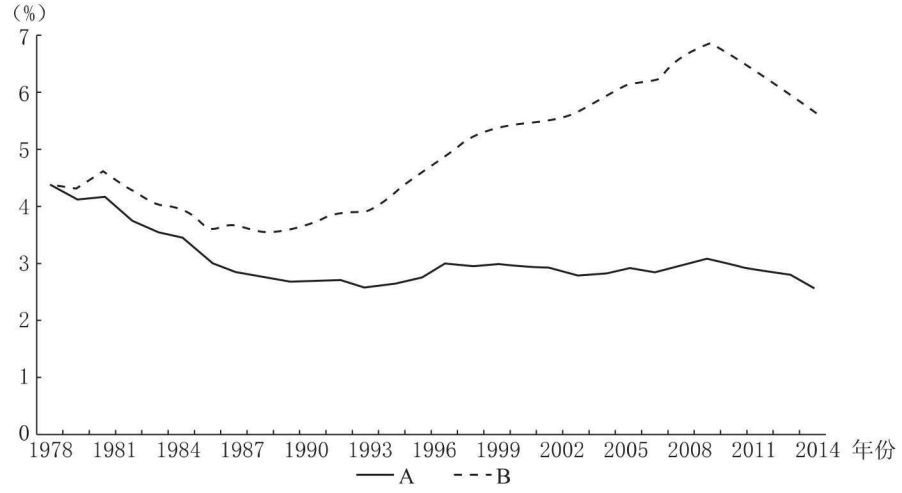


图 1　工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1978—2014 年

注：$A = (Y_i/L_i)/(Y_n/L_n)$，$B = (Y_i^*/L_i)/(Y_n^*/L_n)$，其中，$Y$ = GDP 及其组成部分，按当前价格计算，$*$ 表示按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据；L = 劳动力从业者人数。下标 i 和 n 分别表示中国经济的第二产业（即工业加建筑业）和其他产业。A：以当年价格计算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B：以基期不变价格计算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图 1 列出了中国经济的工业部门相比于其他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发现，以基期不变价格计算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一直以来都远远超过以当年价格计算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这意味着通过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从

工业部门转移到了经济的其他部门。两条曲线之间逐渐扩大的差距进一步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转移往往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加速。因此，工业化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在于工业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它反映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充当了非工业部门增长的一个引擎，也因而成为整体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

然而，由上述描述性分析所做出的判断不一定得到标准的增长核算分析的明确支持。为了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以及工业化的作用，下面两个方程可被应用：

$$(q-l)=g+b_K(k-l)+(b_K+b_L-1)l \quad (1)$$

$$(q-l)=g+b_K(k-l)+b_M(m-q) \quad (2)$$

其中，小写字母 q、l 和 k 分别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劳动就业总量增长率以及资本投入总量衡量指标的增长率；m 为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率。这两个方程是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中推导出来的①，其中 l 和 k 被视为 q 的独立决定因素，而生产率增长 g 被假定为外生决定因素。式（1）的设定是为了检验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存在报酬递增，这反映在系数（b_K+b_L-1）中。式（2）的设定旨在验证工业化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形式为工业增加值在 GDP 中所占份额的变动。

表 2 的上面部分给出了将式（1）和式（2）应用于 1978—2014 年中国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式（1）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下，中国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扩张（b_K）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g）的增长是不显著的，并且，在增长过程中没有报酬递增的迹象，这反映在不显著的系数（b_K+b_L-1）值上。但是，从式（2）的分析可见，一旦引入工业化进展作为解释变量，则除了它本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变成了显著。

表 2　　1978—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式(1)：$(q-l)=g+b_K(k-l)+(b_K+b_L-1)l$				
	g	b_K	(b_K+b_L-1)	
$(q-l)$	2.208 (0.800)	0.647 ***(2.781)	0.436 (0.705)	Adj.R^2 = 0.248
式(2)：$(q-l)=g+b_K(k-l)+b_M(m-q)$				
	g	b_K	b_M	
$(q-l)$	3.928 ***(3.364)	0.437 ***(3.275)	0.461 ***(2.767)	Adj.R^2 = 0.380

① 式（1）即是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变形，式（2）即是附加工业化作为增长动力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变形。这里的变形是两边取对数再求微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续表）

式（3）：$q_N = a + b_N q_M$			
	a	b_N	
q_N	4.189	0.803 ***（2.929）	Adj.R^2 = 0.178
式（4）：$p_M = a + b_M q_M$			
	a	b_M	
p_M	0.858	0.715 ***（4.432）	Adj.R^2 = 0.348
式（5）：$p_N = a + b_{N'} q_M$			
	a	$b_{N'}$	
p_N	4.401	0.299 **（2.919）	Adj.R^2 = 0.179

注：（1）括号内为 t 值；***，**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2）分析数据的时间为 1978—2014 年。有关这些数据处理的解释，请参阅正文。

资料来源：工业增加值和对应就业量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资本数据是作者估算所得。

回想一下，中国的工业增长趋势与整体经济增长趋势是一致的，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来回顾一下对于图 1 含义的讨论，其中显示生产率提高已经从中国经济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因此，得出工业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显著的分析结果，这应该是合理可信的。

（二）“卡尔多—凡登法则”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适用性

然而新古典增长核算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未必完善。从概念上讲，将 l 和 k 视为 q 的独立决定因素取决于一个假设，即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不会存在需求不足问题。如果两种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双向累积因果关系，那么将式（1）应用于经验分析可能会低估规模经济的效应。同时，在式（1）和式（2）中，生产率增长均被视为纯粹由外生因素决定。将这两个式子应用于实证分析因而可能低估其他变量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包括工业化进程的贡献。

在相关文献中，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存在一系列替代方法。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进路，其特点在于努力克服上述新古典主义框架的两个不足之处。这一点已由所谓的“卡尔多—凡登法则”（Kaldor-Verdoorn Law）总结（Kaldor，1975；Thirlwall，1983），其形式如下：

$$q_N = a + b_N q_M \tag{3}$$

$$p_M = a + b_M q_M \tag{4}$$

$$p_N = a + b_N q_M \tag{5}$$

其中 q 表示产出的实际增长率，p 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率（即产出的实际增长率减去总就业增长率，$p = q - l$），下标 M 和 N 分别表示经济的工业（或制造业）部门和非工业（或非制造业）部门。式（3）表明，通过扩大非工业部门的需求规模进而扩大产出规模的方式，工业部门增长贡献于非工业部门的增长。式（5）表明，通过提高非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的方式，工业部门增长贡献于非工业部门的增长。最后，式（4）表明，工业部门的产出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正向而且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卡尔多理论，这种相关性基于动态规模效益，即需求进而产出扩张的效应，形式为干中学，技术升级的诱致型投资，以及经济中专业分工的增加。可以看出，式（3）、式（4）和式（5）并不受新古典主义框架的两个关键假设的限制（Rada and Taylor，2006；Wulwick，1993）。

为了将这些方程应用到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我们对数据做了调整，对于三个方程中的解释变量 q_M，我们使用经济体中第二产业的数据。从定义上讲，第二产业由工业和建筑业组成，而工业包括制造业、采掘业和公用设施生产行业。使用第二产业数据的原因在于，在1978—2014年期间，无法获得工业或制造业完整的劳动力就业数据。

将式（3）、式（4）和式（5）应用于分析1978—2014年期间的中国数据，得到了表2下半部分给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关于工业增长与非工业部门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式（3）和式（5）的分析结果均是统计上显著的。因此，可以推断，工业增长通过扩大非工业部门的需求规模和提高非工业部门的生产率的方式，贡献于非工业部门的增长。这一推论与图1的观察结果一致。同时，对式（4）的分析也发现，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因此，如果关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卡尔多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发现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动态规模效益。

很明显的是，对比表2上下两部分的结果，新古典框架内的分析与后凯恩斯框架内的分析存在重大分歧。直接的分歧点在于，生产率增长是否已经成为增长过程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更根本的分歧点则在于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动态规模效益以及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结构变革，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吗？

鉴于上述新古典分析的概念性问题，以及在后凯恩斯框架内的分析中发现的替代性证据，似乎可以公平地说，对上述问题回答“是”比回答“否”更有可能。这与增长和发展文献中几乎达成共识的观点（卡尔多—凡登法则作为典型事实，在世界后进发展中

被普遍发现是明显成立的）是一致的，并得到了加强（Syrquin，1994）。然而，后凯恩斯框架的一个根本缺陷是，这三条“法则”都是简化形式的，因此不能真正构成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分析只关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作为一种改进的尝试，下一节寻求通过分析中国增长过程的结构和制度特征来修正上述表达式。

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和制度特征

（一）经济增长路径及其转换的效率特性

后凯恩斯经济学倾向于将工业或制造业视为动态规模效益特别强劲的领域（Kaldor，1968；Rowthon，1975；Thirlwall，1983）。虽然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劳动”概念有着重要的共性，但最终把自身限制于将生产率增长解释为纯粹的技术决定。卡尔多—凡登法则的形成确实考虑了需求因素。然而，相关的简化形式表达式却难以阐明技术因素和需求因素相互作用以形成生产率增长的准确机制。

在相关文献中，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理论试图阐明生产率增长过程中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讨论的经济因素是指总需求的条件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参见Lo and Smyth，2004）。需求拉动型生产率增长通常采取的形式包括干中学，需求扩张诱致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投资，以及在整个经济范围内的专业分工的深化——这些均处于“集体学习效应”的准则之下。此外，所讨论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指的是它们利用有利的需求条件产生集体学习的能力。相关文献中也存在一个命题，即集体学习需要稳定或刚性的制度——企业部门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导向关系。换言之，这种生产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存在着必要的权衡取舍——其中，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配置效率有赖于灵活的、由市场决定的制度的存在（Amsden，1989；Aoki，1990；Best，1990；Lazonick，1991）。

这些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和制度特征的理论主张，为分析中国经验提供了很好的见解。Lo 和 Zhang（2011）给出了一个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详细描绘，参考这些理论见解刻画了结构和制度属性。以下三段中的论述（以及引用的统计数据）总结了这一描述，并勾勒出了下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背景。

图 2 描绘了 1978—2014 年中国经济改革时期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演变。演变过程相当惊人，ICOR 在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年代前半期内大致平稳，但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后半时期却是持续大幅度攀升。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结构特性。ICOR 的平稳以至下降反映了整体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替代资本的现象。1978—1992 年，就业和劳动力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3.63% 和

3.60%。就业机会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超过了同样非常快的劳动供给增长。ICOR 随后的向上运动反映了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替代。就业和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02% 和 1.10%——就业增速滞后于劳动力增速。经济增长的路径，似乎从改革前半时期的劳动密集型转向后半时期的资本深化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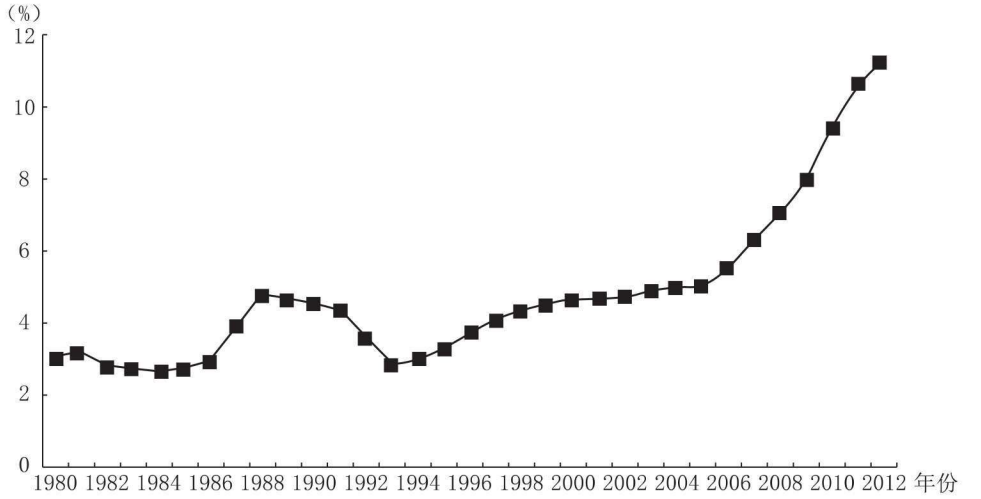


图 2　1980—2014 年资本—产出增量比率

注：资本产出增量比率 $=dK/dY$，其中，dK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dY = 当年 GDP 减去上年 GDP。图 2 反映的是该比率的 5 年移动平均数值。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两种不同增长路径以及从一种路径转换到另一种路径的效率含义是什么？1978—1992 年 ICOR 的平稳可能确实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期——也就是说，它反映了向中国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劳动力丰裕比较优势收敛的趋势。相反地，1993—2014 年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路径可能违背了资源稀缺性原则，导致配置效率下降。但是，经济增长只能依靠配置效率的提高吗？后凯恩斯和新熊彼特理论更倾向于强调生产性效率——即技术进步和报酬递增——的重要性。在中国案例中，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即使在 1978—1992 年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时期，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往往也会超过经济的其他部门（注意以不变价格衡量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上升）。这一观察结果与卡尔多假设是一致的，即制造业的特点是生产率增长要快于其他部门。同时，在 1993—2014 年的资本深化型增长时期，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往往是加速而不是减速。与改革前半期 5.4%的增长率相比，1993—2014 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9.2%。由于某些原因，在改革的后半时期，资源配置效率的牺牲（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这是背离比较优势原则的必不可免

的结果）被生产性效率的提高所补偿。

（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相对效率特性

与此相关，工业部门内国有企业（SOEs）与非国有企业的增长表现，尤其值得注意。Lo 和 Zhang（2011）认为，在整个改革时期，与非国有企业（non-SOEs）相比，中国的国有企业本质上存在较少的遵循市场的属性（market conforming），反而具有较多的压制市场的属性（market supplanting）。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个人化产权原则，这表现在国有企业运营中政府的随机干预（国家—企业关系）、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金融—产业关系），以及较为僵化的就业和薪酬制度（工人—企业关系）。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国有企业在调整自身以应对市场条件变化方面，即在改善配置效率方面，不如非国有企业。然而，国有企业的长期导向制度也有着通过集体学习效应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优点。在 1978—1992 年劳动密集型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的产出增长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 7.5%。而且，这一时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也相当快，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然而，国有企业在 1993—1997 年间确实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几年是政府大力推行紧缩政策、“抓大放小”、“下岗增效”等市场化改革的时期——这意外地导致了宏观上的消费和投资增长停滞，进而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等形式的严重经济问题。然而，一旦政府停止推行这些政策，恢复其促进工业化和增长的政策取向，国有企业就恢复活力。它们在中国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近 80%大幅下降至 1998 年的低谷 33%，随后就在这个水平上稳定下来。显然，国有企业由于其长期导向性制度，特别适应于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路径。

以上观测结果可以通过较为正规的分析，即应用卡尔多—凡登法则，得到进一步验证。根据卡尔多理论，如果存在动态规模效益，生产率增长与产出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尤其在制造业中，因此有：

$$p_t = \alpha + \beta q_{t-1} \tag{6}$$

上式是式（4）的另一个版本，其中，p_t 是工业部门在 t 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率，q_t 是工业部门在 $t-1$ 时期的产出的实际增长率。使用产出增长率的一期滞后数据作为解释变量，意味着这里的预期是产出增长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即生产性效率）具有累积效应，同时又是有利于下文所要分析的情况，即不同类型企业对于短期上偏离累积效应状况的不同的反应和调整，也就是企业的落后性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效率。

将式（6）用于分析 1978—2014 年间中国工业部门（以第二产业来近似）和非工业

部门、以及工业部门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据，结果见表3的上半部分。可以发现，对于这四个“部门”，系数β的值是显著为正的，这意味着在部门层面上可能存在动态规模效益。此外，工业部门的β值小于非工业部门的β值，这并不完全符合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的预期。可能的解释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倾向，挤压了生产性投资，削弱了工业部门的动态规模效益，与此同时提高了非工业部门的收益；而国有企业的β值大于非国有企业的β值，意味着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有能力提高生产性效率，则是跟预期一致。

表3　　1978—2014年经济增长的结构和制度特征

式(6)：$p_t = \alpha + \beta q_{t-1}$

	α	β	Adj.R^2
工业部门	4.634	0.385 ***（1.961）	0.077
非工业部门	1.820	0.641 ***（3.736）	0.276
国有企业	6.757	0.438 ***（1.801）	0.044
非国有企业	5.520	0.322 **（2.214）	0.103

式(7)：$\Delta p_t = a - b(p_{t-1} - p^*_{t-1}) + c\Delta q_t$

	a	b	c	Adj.R^2
国有企业	0.186	0.381 **（2.150）	0.337 （1.452）	0.075
非国有企业	−0.340	−1.343 **（−2.499）	−0.231 *（−1.696）	0.165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4　　1978—2014年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变量	ADF(未带趋势)
工业部门	p_t	−3.378**
	q_t	−3.254**
非工业部门	p_t	−3.481**
	q_t	−3.84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